



詹志芳 著

北京娃

在一个好了伤疤忘了疼的年代，唤回和恢复记忆，
是一种能力。没有记忆的民族，容易在现实的灯红酒
绿中狂欢。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詹志芳 著

北京娃

在一个好了伤疤忘了疼的年代，唤回和恢复记忆，
是一种能力。没有记忆的民族，容易在现实的灯红酒
绿中狂欢。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京娃/詹志芳著.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2. 1
黄土地之歌
ISBN 978-7-307-09370-6

I. 北… II. 詹…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75077 号

责任编辑:张福臣

责任校对:黄添生

版式设计:马 佳

出版发行: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cbs22@whu.edu.cn 网址:www.wdp.com.cn)

印刷:武汉武铁印刷厂

开本:880×1230 1/32 印张:12 字数:329 千字

版次: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7-09370-6/I·477 定价:25.00 元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凡购买我社的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编 委 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主 任 张福臣

邓 贤 叶 辛 白 描 刘小萌

刘晓航 陆天明 张承志 肖复兴

岳建一 胡发云 姜汉芸 晓 剑

郭小东 高红十 董宏猷 谢春池

总 序

叶 辛

40年前，中国的大地上发生了一场波澜壮阔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波澜壮阔”四个字，不是我特意选用的形容词，而是当年的习惯说法，广播里这么说，报纸的通栏大标题里这么写。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当年还是毛泽东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是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

这一说法，也不是我今天的特意强调，而是天天在我们耳边一再重复宣传的话，以至于老知青们今天聚在一起，讲起当年的话语，忆起当年的情形，唱起当年的歌，仍然会气氛热烈，情绪激烈，有说不完的话。

说“波澜壮阔”，还因为就是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和召唤之下，1600多万大中城市毕业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奔赴农村，奔赴边疆，奔赴草原、渔村、山乡、海岛，在大山深处，在戈壁荒原，在兵团、北大荒和西双版纳，开始了这一代人艰辛、平凡而又非凡的人生。

讲完这一段话，我还要作一番解释。首先，我们习惯上讲，中国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有1700万，我为什么用了1600万这个数字。其实，1700万这个数字，是国务院知青办的权威统计，应该没有错。但是这个统计，是从1955年有知青下乡这件事开始算起的。研究中国知青史的中外专家都知道，从1955年到1966年“文革”初始，十多年的时间里，全国有100多万知青下乡，全国人民所熟知的一些知青先行者，都在这个阶段涌现出来，宣传开去。而发展到“文革”

期间，特别是1968年12月21日夜间，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发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掀起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那个年头，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且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要“不过夜”。于是乎全国城乡迅疾地行动起来，在随后的10年时间里，有1600万知青上山下乡。而在此之前，知识青年下乡去，习惯的说法是下乡上山。我最初到贵州山乡插队落户时，发给我们每个知青点集体户的那本小小的刊物，刊名也是《下乡上山》。在大规模的知青下乡形成波澜壮阔之势时，才逐渐规范成“上山下乡”的统一说法。

我还要说明的是，1700万知青上山下乡的数字，是国务院知青办根据大中城市上山下乡的实际数字统计的，比较准确。但是这个数字仍然是有争议的。

为什么呢？

因为国务院知青办统计的是大中城市上山下乡知青的数字，没有统计千百万回乡知青的数字。回乡知青，也被叫作本乡本土的知青，他们在县城中学读书，或者在县城下面的区、城镇、公社的中学读书，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他们读到初中毕业，照样可以考高中；他们读到高中毕业，照样可以报考全国各地所有的大学，就像今天的情形一样，不会因为他们毕业于区级中学、县级中学不允许他们报考北大、清华、复旦、交大、武大、南大。只要成绩好，名牌大学照样录取他们。但是在上山下乡“一片红”的大形势之下，大中城市的毕业生都要汇入上山下乡的洪流，本乡本土的毕业生理所当然地也要回到自己的乡村里去。他们的回归对政府和国家来说，比较简单，就是回到自己出生的村寨上去，回到父母身边去，那里本来就是他们的家。学校和政府不需要为他们支付安置费，也不需要为他们安排交通，只要对他们说，大学停办了，你们毕业以后回到乡村，也像你们的父母一样参加农业劳动，自食其力。千千万万本乡本土的知青就这样回到了他们生于斯、长于斯的乡村里。他们的名字叫“回乡知青”，也是名副其实的知青。

而大中城市的上山下乡知青，和他们就不一样了。他们要离开从小生活的城市，迁出城市户口，注销粮油关系，而学校、政府、国家还要负责把他们送到农村这一“广阔天地”中去。离开城市去往乡村，要坐火车，要坐长途公共汽车，要坐轮船，像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武汉、长沙的知青，有的往北去到“反修前哨”的黑龙江、内蒙古、新疆，有的往南到海南、西双版纳，路途相当遥远，所有知青的交通费用，都由国家和政府负担。而每一个插队到村庄、寨子里去的知青，还要为他们拨付安置费，下乡第一年的粮食和生活补贴。所有这一切必须要核对准确，做出计划和安排，国务院知青办统计离开大中城市上山下乡知青的人数，还是有其依据的。

其实我郑重其事写下的这一切，每一个回乡知青当年都是十分明白的。在我插队落户的公社里，我就经常遇到县中、区中毕业的回乡知青，他们和远方来的贵阳知青、上海知青的关系也都很好。

但是现在他们有想法了，他们说：我们也是知青呀！回乡知青怎么就不能算知青呢？不少人觉得他们的想法有道理。于是乎，关于中国知青总人数的说法，又有了新的版本，有的说是2000万，有的说是2400万，也有说3000万的。

看看，对于我们这些过来人来说，一个十分简单的统计数字，就要结合当年的时代背景、具体政策，费好多笔墨才能讲明白。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还有多多少少类似的情形啊，诸如兵团知青、国营农场知青、插队知青、病退、顶替、老三届、工农兵大学生，等等等等，对于这些显而易见的字眼，今天的年轻一代，已经看不甚明白了。我就经常会碰到今天的中学生向我提出的种种问题：凭啥你们上山下乡一代人要称“老三届”？比你们早读书的人还多着呢，他们不是比你们更老吗？喂，你们怎么那样笨，让你们下乡，你们完全可以不去啊，还非要争着去，那是你们活该……

有的问题我还能解答，有的问题我除了苦笑，一时间都无从答起。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武汉大学出版社推出反映知青生活的“黄

土地”、“红土地”和“黑土地”系列作品这一大型项目，实在是一件大好事。既利于经历过那一时代的知青们回顾以往，理清脉络；又利于今天的年轻一代，懂得和理解他们的上一代人经历了一段什么样的岁月；还给历史留下了一份真切的记忆。

对于知青来说，无论你当年下放在哪个地方，无论你在乡间待过多长时间，无论你如今是取得了很大业绩还是默默无闻，从那一时期起，我们就有了一个共同的称呼：知青。这是时代给我们留下的抹不去的印记。

历史的巨轮带着我们来到了2012年，转眼间，距离那段已逝的岁月已40多年了。40年啊，遗憾也好，感慨也罢，青春无悔也好，不堪回首也罢，我们已经无能为力了。

我们所拥有的只是我们人生的过程，40年里的某年、某月、某一天，或将永久地铭记在我们的心中。

风雨如磐见真情，

岁月蹉跎志犹存。

正如出版者所言：1700万知青平凡而又非凡的人生，虽谈不上“感天动地”，但也是共和国同时代人的成长史。事是史之体，人是史之魂。1700万知青的成长史也是新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不可遗忘，不可断裂，亟求正确定位，给生者或者死者以安慰，给昨天、今天和明天一个交待。

是为序。

1

1968年12月22日的《人民日报》，发表甘肃省会宁县部分城镇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的报道中加编者按，引述了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阴暗的低气压笼罩着北京火车站。站台上锣鼓喧天，彩旗飘扬。低年级的中学生起劲地敲着锣鼓，男生汗湿的栽绒帽子护耳前后翘着，女生的围巾和脖套也粘在了脖子上。中学红代会，军宣队、工宣队的旗子一字排开，“热烈欢送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横幅在寒风中翻卷。锣鼓声震得车上车下的同学听不清对方在喊些什么。灰暗的天空，衬着红旗和横幅，让人觉得很失调。

火车“咣当”一声向后退了一步，又缓慢地向前开动了。送行的人群向火车前进的方向拥去。有些老人已经哭昏过去。知青的家人、同学们都热泪盈眶。那逐渐加速的列车带走了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对老人们来说，带走的简直是生命的一部分，这些家庭被生生地撕裂了。

火车逐渐地加快了速度，车窗口挤满了告别的脸孔。有些男生大胆地把上半身探出窗外。萧南紧咬着嘴

唇，一动不动地站在车窗前。她是一个瘦高的姑娘，面目清秀，齐耳的短发梳着一个小歪辫，一身发白的蓝布学生装。她从人缝中望着妈妈、弟弟远去的身影，痛苦的心紧缩在一起。在她的身上有一种谜一样的气质，说不清是清高还是坚强。离她不远处有一双好奇的眼睛正在观察着她。

火车远离了车站，萧南正要坐下来。突然，她看到关淑兰已经瘫在地上，几个女同学正在把她拉回到座位上。萧南关心地拉着淑兰的手。淑兰已经哭肿了眼睛，她是平生第一次坐火车，大串联她家里都没让她去。她个子不太高，还略有点儿胖，圆圆的脸，梳着两个小刷子辫，她靠在车厢壁上，像是睡着了。她一直不安地想，她一走奶奶、姥姥如何受得了这样的打击。她有三个哥哥，最小的哥哥也比她大四岁，是老高三的学生，前几个月去内蒙插队了。那次，奶奶哭得几天不肯吃饭，对妈妈说：“这是怎么啦？我不要你们好吃好穿地待我，一家人能团团圆圆在一起，我就知足了。”奶奶是说叔叔先去了外地，爸爸支持三线建设去了兰州，现在她的孙子孙女又走了，奶奶哪里受得了。奶奶没有女儿，只有两个儿子。她一辈子生过十一个孩子，有两个姑娘，可都没活，男孩子也只活了两个。孙子辈有两个孙女，另一个还在外地。所以，淑兰是奶奶的掌上明珠，从小由奶奶一手带大。奶奶手里有点钱不是给她买零食，就是给她买花布做衣服，要不是受布票的限制，奶奶可是要好好打扮她了。哪个哥哥欺负她，只要她一叫奶奶，奶奶准会帮着她。小哥哥最讨厌她了，常常趁奶奶不在家时，逗哭她。淑兰和奶奶住一个屋，现在屋里只剩奶奶一人了。想到这里，泪水又从她闭着的眼睛里流了出来。

姥姥更可怜，只生了一儿一女，舅舅已经去世，舅妈带着一个严重脑瘫的儿子和姥姥，靠她一个人的工资生活。淑兰妈妈每月给姥姥十元钱。每次去送钱，妈妈都带着她。姥姥总要哀声叹气地哭一通，说自己命苦。淑兰总是哄姥姥说，等她长大了，要给姥姥买这买那，最终姥姥总是被她逗笑。她真想像大哥那样，过年能买个点心匣子给姥姥送去。现在她去农村了，如何孝敬姥姥呢？谁又能哄姥姥高兴

呢？这不是要了姥姥的命吗？

萧南安慰着她。她们的座位旁围满了人，认识的人都劝她几句，还有人送来了橘子、苹果等。淑兰慢慢地停止了哭泣，人群逐渐地散开了。淑兰对萧南小声说：“张老师真坏！非要让我去农村，不就因为我奶奶是个房产主嘛。早就抄过家了，我奶奶那点东西早就抄没了。我爸爸可是靠劳动吃饭的小职员，她凭什么和我过不去呀？！幸亏我爷爷提笼架鸟游手好闲的，把家产挥霍得差不多了，他也死了，要不这次更要倒霉。我奶奶说，以前她可恨我爷爷了，现在她还挺感谢他的。”

萧南也忍不住说：“昨天我去看我爸爸，告诉他我要走了，我看他脸色很难看。造反派在旁边守着，我爸爸说要我向贫下中农学习，但不要放弃文化学习，要我自己珍重。他屋子的窗户全都用报纸糊上了，这么冷的天也不给暖气，我真怕他病了，他要是病了，造反派可是不会让他去看病的。至少你奶奶，姥姥还有自由，有病还是可以去问医生。”

淑兰听了萧南的话，心里好受多了。于是，又开始关心起萧南来了，说：“你爸爸被打坏的腿好了没有？”

萧南阴沉着脸说：“昨天他还一瘸一拐的呢，我知道他尽力装出没事的样子。”她比较会克制自己，她父亲在五七年就被打成了右派，那时她还没上学呢。萧南很爱她的父亲，看父亲这样受苦心里很难过。但是她绝不会在造反派面前流露出来，她始终坚信父亲不会是特务，更不会反党。昨天，父亲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好像要把她深深地印在脑子里，他知道以后难得见到女儿了。

谭卓娅那夸张的笑声从车尾部传过来，她和一伙人聊得正带劲儿。谭卓娅串联时去过兰州，她说有个男生一气儿吃了六大碗兰州拉面。吃过之后，大家起哄让他跳一跳，他说一跳拉面就从嘴里出来了，这已经成了一个典故。谭卓娅每次都要拿这事开心。他们抢着说起在大串联时去过的地方。去过四川的说，橘子便宜得像白给，甘蔗只五分钱一根。去过广州的说广州的香蕉一毛五一斤。到过海南岛的

说，几个人五块钱包下一棵荔枝树，吃得直流鼻血。谭卓娅说她在四川大邑县参观《收租院》时买了一双草鞋，学着红军的样子，可只穿了两个小时脚就磨出了水泡。

坐在一起的这几个人，都是干部子弟。自从那副把阶级斗争的理论趋于极限的对联一出现，学生就自动分成了许多阶级，即使是“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干部子弟也是等级森严。“不征不将，不抗不校”，意思是在军队里，没有长征过的没有资格当将军，没参加过抗日战争的没有资格当校官。父母的官阶也是子弟的等级。干地下工作的不如当兵的，打游击的不如参加新四军八路军的，渡过江的不如打过日本的，打过日本的又不如爬过雪山的……谭卓娅的父亲是“三八式”的干部，虽是没有长征过，可是去过延安，也是可以炫耀一下的了。

那时，女干部子弟一身军装或一身蓝布中山装，两边的头发压住耳朵，号称鸭尾式。一条拉毛大围巾外加一个雪白的大口罩是最标准最时髦的打扮了。谭卓娅正是这样一身标准的打扮。在这伙儿人中间她父亲级别是高的，所以她非常的自在，说话笑声都带着得意，给人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她说着如何在上海资本家家中吃他们的罐头，如何通过父亲的战友弄到了长江顺流而下的船票，去韶山时又找到一位阿姨住进了省委招待所。总之，她像《八十天环游地球》里的路路通，因为她父亲有良好社会关系，她走到哪儿都没困难。她喜欢专车，喜欢招待所，喜欢高高在上与众不同的感觉。夸张的笑声不仅说明她的身份，也有吸引男生的注意力的成分。她已经到了少女怀春的年龄，希望有更多男生注意她。

谭卓娅高大结实，有干部子弟的优越感，看她那气派就知道她爸爸至少是十一二级的干部。她穿一身褪色的黄军装，头发又多又硬。这时，她坐下来，一只手揽着淑兰的肩头，另一只手拍淑兰的胳膊，劝她别哭。淑兰不想听，说：“我去农村就回不来了，我可没有你那样好的爹妈。”

谭卓娅说：“我的老爹老娘已经靠边站了，老爹每天去掏垃圾，老娘也每天穿得像讨饭婆似的去听工宣队的训。”谭卓娅愤怒地讲

着。她的父亲进城以后步步高升，家里住房越来越大，电话、沙发都有，出入常有小汽车，绝非普通人家能比。她妈妈是人事处副处长，多少次她看见那些普通干部找她妈妈，她妈妈总是拿出一副冷面孔，把人教训一顿，最后说：“你回去吧，组织上会考虑的。”她以为她们家会平步青云永远地升上去，可没想到来了个“文化大革命”。不仅打碎了对将来的幻想，甚至连现实都保不住了。她家电话被拆掉，沙发被搬走，四间房子也被别人占了两间。

从1966年6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那天开始，学校就停课了。大字报铺天盖地。谭卓娅异常兴奋，以前她以为她们这一代再也不会赶上那种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了。当急风暴雨似的“文化大革命”来临之际，她狂热地参加进去。她抄过家，打过人，还给“地富反坏右”剃过头。可她真的以为这些人贼心不死想变天。毛泽东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她参加了红卫兵，还是红卫兵纠察队的成员。从刻蜡板到印传单，从每天散发传单到维持秩序，她忙得都顾不上回家。经常睡在课桌上，在北京火车站的地毯上也睡过。直到有一天，红卫兵纠察队的头儿叫她去，她才知道她父亲已经被审查，她没有资格再当红卫兵，她就像一块烧红的熨斗被丢进凉水里，心里撕撕拉拉的，难过极了。她伤心地摘下半尺多长的印有“西城纠察队”的红袖章。红卫兵总部这些朝夕相处的战友竟没有一人向她表示同情。她一直以为自己属于那著名的对联的上联——老子英雄儿好汉，没想到一小时之后她竟成了下联——老子反动儿混蛋。

一开始，谭卓娅真难受，在家里哭了好几天之后。她贴出坚决支持群众革命行动的大字报，表示要和父亲划清界限。后来，受到批斗的人越来越多，这些人的孩子凑在一起才发现，中央文革里面多数成员搞的原来是一套贼喊捉贼的把戏。

这时，火车早已开出了北京，车站上悲痛的人群被远远地甩在了

后边。萧南轻声地劝淑兰：“你走了，我也走不了。”淑兰鼻子嚤嚤地说：“好吧，咱们俩做伴。”

火车进入了河北省，谭卓娅打开她的军用小书包拿出几个一毛钱一个散发着啤酒花香味的圆面包，一大包猪头肉，还有一包粘着辣椒糊的绿色榨菜头。萧南也赶快拿出小泥肠和法式尖面包。淑兰拿出的是家里烙的芝麻酱糖饼和一饭盒肉末炒土豆丝。

车厢的喇叭里播送着《延边人民热爱毛主席》。有人在车厢那头拉起了手风琴，还有人吹口琴，一群人大声唱着苏联歌曲“告别了，亲爱的故乡，告别了，可爱的姑娘……”“请你吻别你的儿子吧，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有些男生喝着新年才供应的啤酒，以为自己已经是大人了，脱离了家庭，他们有些兴奋。还有的在座位上打起了扑克。

天阴沉沉的，大块的乌云汇集在空中。这样的天气使大家压抑的心情更加难以舒展。窗外开始飘起了雪花。荒凉的土地上什么庄稼也没有，偶尔有几棵树也是光秃秃的，电线杆子飞快地向后退去。萧南看着《中国地图册》，仔细地研究着要路过的车站。

萧南为了不吵醒已经睡熟的同学，把头往淑兰那边伸了伸说：“睡一会吧，明天还不知道会不会拉练呢。”淑兰心里别提是什么滋味了，她最害怕背着一个大行李走路了。她后悔不该带那么多的东西。

她们在热烘烘浑浊空气中一会儿就都睡着了。列车有节奏地行驶着，将这一车学生带向漆黑的远方。

2

淑兰被萧南推醒了，她双手揉着眼睛，小刷子辫也散了一只，系头发的玻璃丝也不知道丢哪儿去了。周围

乱哄哄的，火车已经停下来了，人们忙着从行李架上、座位底下拿出行李。淑兰穿上已经发白的蓝棉猴，那是小哥哥穿不下给她的，又从座位下拉出她的脸盆和手提包，身上挎着黄帆布书包，臃肿笨重地走出车厢。萧南帮她提着剩下的东西。

车厢外的天空阴沉灰暗。从车上下来的人，乱七八糟地站在站台上。淑兰她们是女校，所以，又分了一个男校和两个普通校在这个县。

这时，来了一些县里的干部，用铁筒喇叭招呼着学生们按学校站好队。接着县委领导致欢迎词，不过是反复地说着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只是口音变了，听着怪怪的。县里的干部都穿着中山装、棉大衣，可款式欠标准，看起来有点奇怪。一个有点军人风度，穿着军大衣的人走过来，他是人武部的王部长，四十多岁，红红的大圆脸庞，大衣披在身上，可能他觉得那样比较像首长。他喊着号令，把败兵似的一队人领到了县中学的大操场里。他那正规的号令挺直的腰板和臃肿、邋遢的队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县城街道上挤满了看热闹的人。

县中学里临时搭起的棚子已经准备好了早餐，热气腾腾的大白馒头和胡萝卜猪肉煮凉粉，上面漂着一层红辣子。每人两个馒头和一碗菜。有些女生故意撒娇，也有的是真的不能吃辣椒，她们端着碗，吵得大师傅头都痛了。大师傅只好又做了一些炒白菜。

谭卓娅也跟着叫不能吃辣椒，是想让人注意她。淑兰朝着萧南说：“这里的馒头比北京的白。这菜是怎么回事呀？凉粉怎么能够煮？这是夏天，凉拌的，这儿的人真怪的。”

谭卓娅开始卖弄起来：“你听过宁波人吃肉芽吗？肉生出蛆，有客人来时，在肉底下放盆水，用棍子打，蛆掉下来，再用油炒，那是当地的好菜。”淑兰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萧南也说：“我们串联到广州，都想吃当地的风味菜，十五个人凑了点钱去吃‘龙虎斗’。”

淑兰问：“什么叫‘龙虎斗’呀？”

谭卓娅说：“龙就是蛇，虎就是猫。”

淑兰张着嘴，瞪大了眼睛。

萧南接着说：“我们问服务员还有什么特色菜，服务员说还有‘八仙过海’。我们要了八仙过海，还点了蚝油牛肉、烧鹅。菜一上来，我们全呆了。原来‘八仙过海’是八只老鼠，吓得两个女生不吃了，有一个男生也说肚子疼赶快走了，就剩我们四男三女。”

淑兰着急地问：“你吃了没有？”

萧南说：“当然吃了，花了那么多钱哪能不吃呢？你别忘了，我是广东人。”

谭卓娅问：“‘八仙过海’好吃吗？”

萧南说：“还真好吃，肉又细又嫩。广东人说自己，是四条腿的桌椅不吃，两条腿的人不吃，剩下的都吃。”

等这些人吃完饭再看看操场，满地是挑出来的胡萝卜、肥肉片、辣椒还有凉粉。大师傅们心疼得直摇头，这些城里的娃真不懂事，糟蹋这么好的东西。

这时集合了，宣布各村的人名单。淑兰还没听够，揪住萧南说：“到了村里你再给我讲一讲，啊？”

她们村一共七个人。除了她们三个，另外四个是男校的学生。谭卓娅忙着和人告别，在有小镜子绿塑料皮的小本上记着公社和村名。整个大车就等着谭卓娅一人了。

大车穿过县城，她们仔细地看街两旁的人。这些人虽说住在县城，可看起来还是像乡下人。男人、女人、老人、孩子都两手一揣，面无表情，眼睛直愣愣地盯着看。脸好像从来没有洗干净过，孩子们鼻涕拖得老长，手黑得像猴爪子。突然，车上抱着小提琴的小个男生叫起来了：“你们看呀，那棵树上有鸡。”果然，树上站着好几只鸡。那树有一丈多高。萧南看到过日本长尾鸡站在树上的照片，在照片上也看不出那树有多高。眼前的情景真有点奇怪。三年困难时期，许多家都养过鸡，她家的保姆也养过几只，可没见过鸡会飞，她问赶车的大爷：“大爷，那些鸡是怎么上树的？”

大爷说：“飞的呗，这地方的鸡都会飞。”

这下车上可是热闹起来了，都议论着“飞鸡”。这时，那些鸡又扑啦啦地都飞下来了，这些鸡个头小。“这可能是原鸡的后代吧？”萧南这样说着，只觉得车尾有一双眼睛在看着她，回头一看，那是一个高中男生，已经有了成年人的体魄。他们的眼光只对视了一秒钟，就都局促地分开了。萧南可以感觉到他眼光里的坚定和成熟，这是在女校的学生里从没有看到过的。

大车出了县城走在土路上，周围景色有些像秋天。路两旁种着大杨树和一种不知名的树，问了赶车的大爷，才知道是泡桐树。焦裕禄在兰考带领当地老百姓种的不就是泡桐吗？他们越发地兴奋。地边上长着红褐色的草，黑绿色的麦苗一垄一垄整齐地伸向远方，土坡上偶尔有人放着几只羊，羊毛一坨一坨的，脏脏的。坐在大车上，一眼望去能看出十几里地。淑兰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景象，她真的很兴奋。这样辽阔的土地，这样的地貌让她觉得新鲜。在北京她最经常走的是胡同，最宽敞的地方也就是天安门了。

赶车的大爷拿出了黑黑的比烟盒略长一点的烟荷包，往烟袋锅里装烟，又细心地用拇指把烟末压实。然后，把烟袋叼在嘴里，不知从哪儿揪出一小撮黄黄的棉花，用两块黑石头狠命地打了几下，棉花被引着一点点火星，大爷小心地吹着，棉花有了一点红红的火。他把棉花放在烟袋里，吸足了一口气，两个腮帮子都瘪进去了。烟锅里的烟末子红亮起来，车把式才心满意足地抽起来。学生们像是在参观周口店北京猿人纪念馆，看猿人取火似地看着他的每一个动作。

“老乡，抽支烟。”剃光头的男生递过去一支大前门，大爷接了过去，看了看，很小心地夹在了耳朵上。“老乡，你抽吧，这儿还有呢。”光头男生又递过去一支烟。

过了一会儿，淑兰身上开始发冷，腿也有点儿麻。“大爷，还有多远呀？”

“不远了，还有十二里地。”

“大爷，停下来，让我们活动活动吧。”淑兰请求道。

“吁……”大车停下了。谭卓娅首先跳下车，男生比女生动作灵